

关于《上清经》

丁培仁

提 要:本文探讨《上清经》与上清派的命名、《上清原统经目注序》的撰作时间和作者以及东晋《上清经》的成书等问题。着重考察了华侨、杨羲、许谧、许翮等制作的首批上清经、传、诰的情况,并列书名、篇目;同时指出《上清经》的某些复杂性质。本文对与经书相关的道教分派标准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丁培仁,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副教授。

主题词:《上清经》、道教派别、《上清原统经目注序》、东晋《上清经》

要详尽无遗地搞清《上清经》,以一人之力似不可能。因为《上清经》并非一部一旦造出便不曾更改的经典,而是一组数目可观、经不同时期多人之手制作、改窜的众经,其复杂程度远远超乎常人的想象。要在一篇短文中讨论这些细节,当然是无法办到的。本文的目的是围绕着有关《上清经》的几个问题,提出一点线索,以供参考。

一、《上清经》与上清派

上清派是东晋中叶以后形成的道教派别,因遵奉一组重要经典《上清经》而得名,这几乎已是老生常谈。当然,这种说法并不错;不过有必要指出两点:第一,“上清派”这个名称是后人所加,当时人并不如此称呼。奉其道者自称“上道”、“上清家”。(“灵宝派”、“茅山宗”也是后人的提法;至于“葛氏道”则更带随意性。)第二,人们往往把道教的派别等量齐观。其实,道教分派复杂,标准不一。称“教”则有正一、全真之分^①;称“宗”则有南北二宗及全真内部宗派。称“经教”是在南北朝至北宋间,以经书系统作为分派标准。例如道教类书《云笈七签》在总纲“道德部”有“道教经法传授部”、“经教相承部”,“经法”大致相当于“经教”,因为北宋以前所谓“法”意谓“教”,犹“佛法”即“佛教”。按照这一标准,上清、灵宝、三皇皆系经教,有别于唐宋以后流行的北帝、洞渊、天心、神霄、清微等所谓道法派别。后一类所谓“法”意为“方法”,“道法”就是指施行符籙、咒语(广义地讲,还包括斋醮时的赞颂、章奏、科仪)的方法。发挥《灵宝经》中相应内容的叫作“灵宝大法”,其间又分化出各种派别(有些是依托“灵宝”之名如两宋间灵宝净明法派,该派书无论称“经”称“法”,多冠以“灵宝净明”之名)。作为经教派别之一的上清派,既有别于唐宋以后道法派别,亦非严分门户的宗派。这一点从创立者(即造经者)原出天师道,并传《灵宝五符》、《三皇内文》;陆修静兼传正一、灵宝、上清经教;被视为上清派主要代表人物、“茅山宗”的实际开山人陶弘景亦习天师道法(参《登真隐诀》);以及《真诰叙录》提到的传写《上清经》的人员构成的复

杂等等方面可以看出。人们之所以称上清、灵宝为派,而不称三皇为派,盖因制作、传习《上清》、《灵宝》经书的人比较容易辨认,而《三皇经》的传派情况并不是那么清楚,且被视为上清、灵宝二派的开创人或代表如杨羲、葛氏、陆修静等也传《三皇内文》。其实,从经教这一角度来看,三皇未尝不可称派。

二、《上清原统经目注序》的撰作时间和作者

《云笈七签》卷四收《上清原统经目注序》涉及《上清经》的由来。陈国符先生据“此序仅述至真经复归马氏为止”,“故拟此文本顾欢撰《真诰》”^②。按《上清众经诸真圣秘》卷七引有《源统经目》(陈亦指出此点),乃上清经书目录,与《真诰》别为一书。又考宋齐间人顾欢在东晋中叶杨羲降神的“真授”材料基础上编撰有《真迹》一书,非陈所说《真诰》,《真诰》系梁名道陶弘景据前二者改编而成。即使假定注序的作者为顾欢,《上清原统经目》的作者问题仍未解决,因为作目录加注撰序的不一定是同一个人。

那么,这两项的作者究为何人?仅能从序文本身窥探到一点线索。注序云:

玉斧(即许翮)子黄民,黄民子豫之,以(宋文帝)元嘉十二年(435)终剡之白山。临去世之时,以上清宝经、三洞妙文封以玄台,印以白银,留寄剡县马度生家。……有道士姜化者,常憩马舍,究悉经源,苦求开看,马氏固执,竟不从命,结跏无方。是时宋明皇帝崇敬大法,招集道士供养后堂。姜化乃因后堂道士姜季真密启之,帝即命使逼至京,乃拜礼。……(宋苍梧王刘昱)元徽元年(473),马氏即出诉启请其经,诏勅听还。于是天藏真书复归马氏。兹乃上清注笔,朱简紫书。后之凡庶,摸(摹)而传奉,号曰‘真迹’。今记神王所撰宝经三十首篇章,并指事为名。……余宿植缘会,游涉法源,寻检众经,为《上清》目义。非敢有神大乘,聊自记而已。

“豫之”即《真诰·真胄世谱》所记许荣,系许黄民长子,“第一名预之。宋元嘉十二年亡,不知年几”。他是将王灵期之经窜入杨(羲)许(谧、翮)经中、使后人难以辨别二者的重要人物(详后说)。“马氏”指《真诰叙录》所记东晋元兴三年(404)从许黄民那里传承“杨许手书”的马郎、马罕的后裔。据注序,马度生系许豫之同时人。注序记至元徽元年,其时陆修静尚在世。但这只能作为注序制作年代的上限,亦即判定序文撰于公元473年之后。由此使我们联想到一个相似案例——敦煌遗书《老子变化经》,日本学者吉冈义丰根据老子变化最晚的年号是永寿元年,认为出于东汉桓帝永寿元年至延熹八年(155—165)。但从书中内容(如称引《黄庭经》)、用语(如说老子“汉时号王方平”,非当代人口吻)来看,却并非汉代编定^③。如果以书中出现的老子变化最晚年号(或时间)作为判定某书制作年代的最重要依据,那么是否应当认为同类书《太上老君开天经》既述说到周初止,则是出自稍晚的周人之手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有其他相关材料证明此书为晋道士张洋所造。可见判定某书的制作年代和作者应考虑多种因素。在没有本文以外的证据的条件下,就应当联系本文的上下文来加以考察。而从《上清原统经目注序》上下文来看,作者似为亲历宋明帝奉经崇道之人;上清众经也被纳入三洞经书之列。就目前知道的情况而言,陆修静颇受明帝礼敬;先撰成《灵宝经目》,后于泰始七年(471)撰《三洞经书目录》,是合乎上述条件的。而且序中所说“真迹”乃泛指上清众经,非专指《真迹》。因此并不排除下述可能,即:陆修静先整理灵宝、上清、三皇等系经书,分别撰成目录(《灵宝经目》原貌因敦煌遗书

而大白于世,而陆撰上清经目则迄今未详),《上清原统经目》正是陆撰上清经目。后为经目加注(“为《上清》目义”),因系为自己备考用(“聊自记而已”),故未留姓名。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顾欢专奉上清经,称之为“大乘(较早的《灵宝经》也自称“大乘”),《上清原统经目注序》就是顾欢据陆修静上清经目加注撰序而成的东西。总之,目前尚不能确定注序必为顾欢撰(断为顾欢撰《真诰》更是错误),注序作者或为陆,或为顾,两种可能均存在。

三、东晋《上清经》

关于《上清经》的由来,歧说纷纭,较系统的叙述,见于《上清原统经目注序》、《洞真上清神州七转七变舞天经》、《玉纬》引《正一经》、陶弘景《真诰叙录》、李渤《真系》、《云笈七签》卷四《上清经述》等^④。其中除陶、李外,多神话色彩。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说法出自前述《上清原(源)统经目注序》。该序声称:

上清者,官名也。……宫有丹青金书玉字上皇宝经,……起于九天之王,九玄道君推校本元,……以中皇元年九月一日,……命东华青宫……撰定灵篇,集为宝经。传至汉武帝时得经。……火烧柏梁台,经飞还太空。……太元真人茅君讳盈师西城王君,受上清玉珮金钗二景璿玑之道,以汉宣帝地节四年三月升天。又玄州上卿苏君讳林,师涓子,受上清三一之法,神爵二年三月六日登天。又周君、李君众仙各有所得,并相承经业,多不传世。汉孝平皇帝元始二年九月戊午,西城真人以《上清经》三十一卷于阳落之山授清虚真人小有天王王褒。褒以晋成帝之时于汲郡修武县授紫虚元君南岳夫人魏华存。华存以咸和九年岁在甲午,乘飚轮而升天。去世之日,以经传付其子道脱;又传杨先生讳羲。羲生有殊分,通灵接真,乃晋简文皇帝之师也。杨君师事南岳魏夫人,受《上清大洞真经》三十一卷^⑤。

“九天之王”,在东晋所出首批上清经之一《太上三天正法》中称“九天真王”,是传经的最高神,位列元始天王、太上大道君之上。这里提到的茅盈、西城王君(王方平)、苏林、涓子、清虚真人小有天王王褒、周君、李君都是上清仙真。其中周义山(字季通)相传遇司马季主受《石精金光藏景录形》,后授华侨经书。被尊为紫阳真人。李遵(字安林)相传撰《茅三君传》,被尊为中候仙人。魏华存可能历史上确有其人。据说她是任城人,晋司徒魏舒之女,字贤安。嫁与太保掾南阳刘文(字幼彦)。生二子,长子刘璞,次子刘瑕,均有官身。魏为天师道女官祭酒,于晋成帝咸和九年(334)去世,住世八十三年。被道教徒尊奉为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南岳夫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九玄道君集为宝经的提法跟后出《上清神州七转七变舞天经》所说“凡上清宝经三百卷、玉诀九千篇、符图七千章,皆出元始高上玉帝”显然有别;“集为宝经”在后世道书中被增衍为“集为宝经三百卷”。无论如何,这都是神话,不可据为信史。但有两点应予指出:一、序文把传经神话连接到历史人物杨羲这里,而魏华存降授上清经给杨羲是道书中一致的说法,这正给我们判定《上清经》的制作年代提供了上限。二、声称《上清经》有三十一卷,而不是后世道书所说数百卷、几千篇,这又给此处的讨论限定了范围。

比较而言,梁代道士陶弘景的记述有更多的真实性。他在《真诰叙录》中说:

伏寻《上清真经》出世之源,始于始哀帝兴宁二年太岁甲子(364),紫虚元君南岳夫人下降,授弟子琅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杨某(即杨羲),使作隶字写出,以传护军长

史句容许某(即许谧),并第三息上计掾某某(即许翮)。二许又更起写,修行得道。凡三君手书今见在。经、传大小十余篇,多掾写;《真诰》四十余卷,多杨书。

“真授”,即仙真口授的意思,这部分材料后为顾欢、陶弘景编成《真迹》、《真诰》(《真迹》即北周道教类书《无上秘要》所引《真迹经》,又名《道迹经》,现存明《道藏》尚收有此书残篇《道迹灵仙记》)。“传”当指上清诸仙真传,如《茅君传》、《王君传》、《周君传》、《苏君传》、《魏夫人传》等等。经、传合起来才十余篇,除了这些传,可知杨、许时称经的书不多。

在通神降经过程中,还有一个人物华侨。据《真诰叙录》记载:“众真未降杨之前,已令华侨通传旨意于长史(许谧)。华既漏妄被黜,故复使杨令授,而华时文迹都不出世”。这是一段重要记载,它表明在杨羲之前,原是由华侨通神造经,因他泄露天机,改由杨羲主持,而华侨书写的“神文”也改写到所谓“杨许手书”的经、传、诰之中了。关于华侨身世,《真诰·真胄世谱》记述他跟许氏一样同属吴姓世族,二家有姻亲关系。“世事俗祷”,本从事巫鬼术。后因有不快的心理体验遂改信道教,“于鬼事得息,渐渐真迹来游,亦止是梦”。声称夜半见裴清灵、周紫阳(前者即上清派所奉另一仙真清灵真人裴君,字玄仁,亦有传)。因此许谧首选他通神降经也在情理之中。陶并指出,《周紫阳传》即是华侨所造,与《真诰》相连。《周紫阳传》保存在明《道藏》中,其中列有《周君所受道真书目录》实为上清经目,与杨许书《真诰·甄命授》多相印证,对探明东晋中叶首批《上清经》有较大的帮助。其次是杨羲,幼有“通灵之鉴”。早在降经前十五年(永和五年,即公元349年)即受《中黄制虎豹符》,次年又从魏夫人长子刘璞受《灵宝五符》。但距魏夫人去世又已十五年,未闻传授《上清经》。可见首批《上清经》是由华侨、杨羲、许谧、许翮等人以神降授的名义制作的。对于其实况,尚可从《真诰叙录》和《真诰》各篇陶注某些具体的记述加深印象。限于篇幅,此处就不一一引述了。

然而根据一些上清派的神仙传记,好像早在汉代《上清经》就已传世。关于这个问题,应从道教文献学的角度作进一步考察。首先,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业已考证,这些传记多出出于晋代(当然,陈尚未明确指出,它们多为上清派创立者作)。比对《真诰叙录》所记东晋中叶造经时“经、传大小十余篇,多掾(许翮)写”,“悉杨(羲)授旨疏以示许尔”,可知这些神仙传记本身就是东晋中期上清道士所作(在《真诰》原始材料各处有所披露)。其次,如果上清众经在汉代已经传世,则两晋间名道葛洪不可能一点也不知悉(或许不知其中一部,但不可能全然不知)。但在《抱朴子内篇·遐览》著录其师郑隐的道书目和其他各篇中却没有著录、征引上清众经(灵宝诸经除《灵宝五符》亦然)。仅提到《黄庭经》(此当指后世所称《黄庭外景经》者,上清道士据此敷衍成《黄庭内景经》,但此经仍未列入《上清经》三十一卷之数)。此外,葛洪著录的《二十四生经》可能就是灵宝派《洞玄灵宝二十四生图经》和上清派《太微帝君二十四神回元经》二书的原本^⑥,但不见冠以“上清”、“洞真”之名。因此大多数《上清经》是在东晋中叶以后制作和传布的。

在确定这一点之后,尚应着重指出:即使是《上清经》三十一卷,也不全是华侨、杨羲、二许制作的。许谧死后,其孙许黄民成为主要传经人(许翮早卒),也有数卷散出在诸亲友间(包括句容葛氏)。东晋末,王灵期见葛巢甫造构《灵宝经》,便从许黄民处求受《上清经》,“乃窃加损益”,“凡五十篇”。就这样,《上清经》在东晋末刘宋时始广为流传。“传写既广,枝叶繁杂,新旧浑淆,未易甄别”。陶弘景特别指出:“自(王)灵期已前,上经已往往

舛杂,……杨君去后,便以动作。故《灵宝经》中得取以相揉,非都是王灵期造制,但所造者自多耳。”^⑦甚至许黄民的长子许荣(参前文)反过来“因又以灵期之经教授唱言,并写真本(按指杨、许经书),又皆注经后云:‘某年某月真人授许远游。’人亦初无疑悟者。”^⑧比对现存《上清经》,确有此种情况。到南朝时,《上清经》已远远超出三十一卷之数,于是“三百卷”说便应运而生。实际上无论“三十一卷”说,抑或“三百卷”说,都是为了便于继续造经,一如王灵期依《清虚真王君传》、《南岳魏夫人传》等传记所提到的经书题目“张开造作”那样,因为在“三十一卷”说和“三百卷”说提出之初都并没有那么多书。

关于《上清经》三十一卷之著录,无论中国学者还是日本学者,多根据《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五《上清大洞真经目》或《太真玉帝四极明科经》^⑨。也有人提到《上清源统经目注序》^⑩。第一种原名《三洞奉道科戒》,隋代道书。第二种系上清派科文,部分内容应出自东晋,成书于南朝。第三种出南朝宋,然今有序无目。其实,华侨撰《紫阳真人内传》和《真诰·甄命授》反映东晋中叶造经之初的情况,更为真切,因而更为重要。(除上述,《上清太上八素真经》、《九真明科》均有上清经目。)从时间先后来看,杨羲所造、拟造经典,不少书名出自华侨所撰传。兹将《紫阳传》中书目转录于下:

△金阙帝君守三元真一法

龙蹯经 三皇内文 按此二经在葛洪书中有著录、征引,不在《上清经》之列。

赵他子芝图十六首

△五行秘符

△王先生黄素神方五帝六甲左右灵飞之书

△二十四诀

上魏君太素传左乙混沌东蒙之策右屯毬杀之律

△太和玉女大有妙经太上素灵经

△沙野昂先生泰清之经 按此经当指《太清经》炼丹之书,也不在《上清经》之数。

△宁先生大丹隐书八稟十诀

△阴先生九赤斑符

△臧延甫忧乐曲素诀辞

△淮南子成天关三图

△张子房泰清真经 此同为炼丹书

李氏幽神经

高丘子金方二十七首

△阳安君金液丹经九鼎神图

△青精先生八表黄素传

△李子耳隐地八术

△赵伯玄三九素语

△幼伯君丹字紫书三五顺行

司命君经青图上皇籍

△墨翟子受紫度炎光内视中方

△太帝候夜神童金根之经

- △司马季主石精金光藏景化形法
- △刘子先七变神法
- △谷希子黄气之法泰空之术阳精三道之要
- △王子乔素奏丹符
- 南岳赤松子上元真书
- △九老仙都君黄水月华四真法
- △皇人八素真经太上隐书
- △万先生九真中经
- △玉壶子十人九气丈人得白羽紫盖黄水月华
- 青真小童君金书秘字
- △龚仲阳仙忌真记
- △中央黄老君大洞真经三十九篇

△带符号的书名在后来造制的《上清经》和《真诰》中能够找到对应名目,如《上清大洞真经三十九章》、《九真中经》、《八素真经》、《太上素灵洞玄大有妙经》、《石精金光藏影录形神经》、《神州七转七变舞天经》等等。不带△的,有的可能是先有设想,后据此造经,名目有异(名不同而观念则一)。如《七圣玄纪回文九霄白简青录得道之名》可能是据《司命君经命青图上皇籍》名而造制,二者均属道教谱录。另有一些是已有经名,如《太清经》,在此列举了二种,应当是代表了在通神幻觉中的不同传系。《幽神经》,在杨、许所造“真诰”(后顾欢、陶弘景所编《真迹》、《真诰》)中也许已改名为《宝神经》,但依然是仙宫“裴清灵锦囊中书”,亦即虚目(有目无书)。杨羲通神记录中提到的《四极明科》,可能也是根据华侨设想的“律”而构造的,后来也确实形成了书,不再仅仅是虚目。

那么,华侨、杨羲等人究竟制作出了哪些经书呢?这必须考察原始记录《真诰》。《真诰·甄命授》实际上是杨羲已造、拟造经书目,它与华侨书目不同之处主要有两点:一、它多指出某书的功用,如《曲素诀辞》用于招六天之鬼等等。二、它明确指出哪些书“在世”,即已经造出。兹将标明已经造出的书名称转录于下:

- 八素真经太上之隐书
- 九真中经老君之秘言
- 除六天之文三天正法
- 石精金光藏景录形
- 飞步七元天纲之经
- 大洞真经三十九篇
- 曲素诀辞

根据《真诰》各篇的叙述,还可以补充以下成书:

- 黄庭内景经 按此是据《黄庭经》(《即黄庭外景经》)敷述而成。
- 太微黄书
- 太素五神经 按《九真中经》有太素五神气法。
- 二十四神经
- 回元隐道经

八素阴阳歌 参《洞神八帝妙精经》。

灵书紫文 陈国符已指出,即今传《皇天上经金阙帝君灵书紫文上经》、《皇天上经灵书紫文仙忌真记上经》和《太微灵书紫文琅玕华丹神真上经》。按第二种经名本于华侨《周紫阳传》中所谓“仙忌真记”,但今本疑出南朝。

大洞玄经 按《真诰》“或讽明《洞玄》”,《黄庭内景经》“但修《洞玄》与《玉篇》”,均指此书,而不是后世所谓《洞玄灵宝经》(用“洞玄”专指灵宝经是刘宋以后的事)。今本沿袭宋本避赵玄朗讳,名《洞真太上素灵洞元大有妙经》。

七元星图 简称《步图》

豁落符

上清后圣道君列纪 简称《列纪》

此外,尚有若干仙传和《真诰》(即《真诰》),已如前述。这些就是东晋中叶已造书的情况。

这里必须附带指出一些复杂情况:第一,杨羲降神记录《真诰》中称引不少书,例如“《消魔经上篇》曰”、“《丹字紫书三五顺行经》曰”、“《石景赤字经》曰”、“《紫度炎光内视中方》曰”、“《太上天关三经》曰”等等,并不意味着它们当时已经成书,而很可能只是一些支言片语(直到梁陶弘景时,还说《太上消魔经》“亦未出世”便是证明)。第二,这些称引的书名所指的相应文字内容已被纳入顾、陶所编《真迹》、《真诰》各篇之中,否则就无法解释有关东晋中叶“经传十余篇”、“真诰四十余卷”这一记述。第三,还有一种情形即如陶弘景所说,许黄民长子许荣将王灵期经跟杨许书混在一起,题称许迈受,如《神虎经》等即是。这些书也应断为东晋时代《上清经》。第四,据《真诰叙录》记载,在王灵期之前已有人制作杨许手书以外的经书,致使《上清经》舛杂,《灵宝经》中得取以相揉。除非作过细的考证,恐怕是难以甄别的。最后,指出《上清经》首造于东晋中期,并不意味着否定书中某些思想、道术内容可能出自更久远的道教传统。但这已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责任编辑:澧渝)

①张宇初《道门十规》说:“曰教则有正一、全真之分,曰法则有清微、灵宝、雷霆之目。”

②《道藏源流考》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第一版第15页。

③拙稿《道教典籍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考证,认为编定大约在魏晋间。

④道书中关于《上清经》的来历的说法多且杂,例如《无上秘要》卷三十《经文出所品》说道君在中皇元年九月一日命东华青宫揀校古文,集为宝经三百卷付上相青童君。象这类片断的叙述在道书中随处可见。

⑤《云笈七签》卷四《道教经法传授部》。

⑥拙稿《道教典籍百问》已经指出,参该书第29页。

⑦⑧《真诰叙录》。

⑨前者如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后者如代表日本学者八十年代研究水平的《道教》(福井康顺等监修,有朱越利中译本)第一卷。

⑩见刘琳《论东晋南北朝道教的变革与发展》一文,载《历史研究》1981年第5期。

ABSTRACT

(Translated by Luo Tongbing)

supreme clarity scriptures

Ding Peiren

This thesis deals with the problems of supreme clarity scriptures, nomination of supreme clarity school, the author and time of Shang Qing Yuan Tong Jing Mu Zhu Xu and completion of the book of supreme clarity scriptures in Eastern Jin Dynasty. The thesis focuses on examination of the making of the first batch of Jing, Zhuan and Gao of supreme clarity by Hua Qiao, Yang Xi, Xu Mi and Xu Sui. A list of titles of books and number of chapters is given here. Also, the complexity of supreme clarity scriptures is pointed out. The author proposes his own idea about the dividing criteria of Taoist schools, which is connected with Taoist scriptures.

Key words: supreme clarity scriptures, Taoist Schools, Shang Qing Yuan Tong Jing Mu Zhu Xu, supreme scriptures in Eastern Jin Dynasty

From personality beauty in philosophical Taoism to

immortality beauty in religious Taoism

Pan xianyi

The change from personality beauty in philosophical Taoism in Pre – Qin to immortality beauty in religious Taoism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was exhibited most representatively in He Shang Gong's Commentary to Lao Zi and Xiang Er's Commentary to Lao Zi. They exhibited the change in Taoist aesthetic personality in four aspects: the interior and exterior of personality beauty, contrast between mortal and immortal personality, immortal aesthetic psychology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Taoist personality practice and artistic beauty. Thus they proved the affinity between the aesthetics of philosophical Taoism in Pre – Chin and the aesthetics of the later religious Taoism, as well as the latter's deep cultural background.

Key Words: Religious Taoism, personality beauty, thought

Dhyana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Fang Litian

Dhyana was an important practice of Buddhism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relatively stable groups and teaching lineage came into form among the dhyana teachers and monks.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many dhyana bases appeared along the both sides of Yangtze River and east of Zhejiang. This thesis deals with the dhyana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Dhyana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dhyana groups, dhyana teaching lineage, dhyana bases.

Examinations of the Tun – huang manuscripts of Notes to the Commentary on Sukhavati – Vyuba

and Notes to the Commentary on Antayus Dhyana Sutra

Liu Changdong

The Notes to Commentary on Sukhavati – Vyuba and Notes to the Commentary on Antayus Dhyana Sutra were found only in the Tun – huang manuscripts. Yet no deep research has been made about the two texts though Japanese scholars noticed them over half a century ago. Through examination of the time and author of the texts, this thesis revised Mochitsuki Nobunaga's proposition that both the texts were written by Lingyu. Also studied in this thesis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oughts in the texts, which are mainly about the deciding of lotus grades in the pure land. This research is very valuable to the comprehensive and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doctrines about Amitabha's pure land.

Key words: Tun – huang manuscripts, Notes to the Commentary on Antayus Dhyana Sutra, Ling Yu, deciding of lotus grades.